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上册

朱成甲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朱成甲编

(上册)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上册

朱成甲编

责任编辑：黄鹤逸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32,000 印张：19.375 印数：1—21,400

统一书号：3109·505 定价：2.40元

序

王 首 道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最近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朱成甲同志经过辛勤工作，从全国报刊上精选了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中共党史研究论文九十八篇，汇编成册。《论文选》反映了我国史学界这一时期对党史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这对于广大干部和青年进行党史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强爱国主义观念，确立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诞生以来，已经历了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一八四〇年发生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战争以订立可耻的城下之盟而告结束。此后，清政府不仅和英国，而且被迫和美国、法国、俄国、日本等侵略国家订立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和战后的形势，不但加深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和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清朝末年，天灾连续发生，土地兼并日烈，统治者搜刮愈重，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会党活动日趋频繁，民变纷起。从一八五〇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掀起农民革命大风暴以来，革命人民为反清反封建曾进行了长期的、前仆后继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

争，但都被清朝封建统治者用武力残酷镇压。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经济由此也发生重要变化，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增长，一部分地主官僚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同时一部分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成产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大战的时机，使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也随之激增。工人阶级是当时新的社会力量，它的产生和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共和制度，予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较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剥削者的地位和经济力量的薄弱而害怕群众，不能把革命坚持到底，特别是由于上层资产阶级勾结封建势力叛变革命，致使这次革命半途流产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革命人民为了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得不继续进行斗争。

软弱的资产阶级拯救不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小军阀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宰割着中国人民。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军阀统治日益黑暗，中国的前途、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一切真正抱着改造中国远大政治理想的中国人，已感到中国人民的历次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领导的那样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失败了，都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妙药试过了，也失败了，也救不了中国。于是寻求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来挽救中国，研究新思潮成为一时风尚，各种形形色色救国主张也应时而生，出版书刊，举行学术讲演，争论纷纷，莫知谁

是。正在这时，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热诚地认真研究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广为宣传。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取得了一条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就起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艰难曲折的斗争。由于依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依靠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统一战线形成的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立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我国领土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义改造，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伟大历史任务的基础上，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在这些胜利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左的偏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左倾错误的萌芽，导致以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建国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作的分析与估计错误，夸大了敌情，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左倾思想恶性膨胀、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肆意破坏，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个教训是极其沉痛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功劳，这又一次证明我们党和人民是有力量的，是坚不可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确立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认真纠正“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战略决策，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党和国家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兴旺发达景象。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我党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大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它是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强大武器。大会选举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中央领导岗位，实现了新老合作交替，使党最高领导层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

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又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黑暗面的历史。它记载着党在六十多年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有着极为丰富、生动的内容。

加强党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原则，特别要强调全面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历史。研究党史，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决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并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人民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党六十多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坚持了这种结合的原则时，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这种结合的原则时，革命事业就受挫折，甚至失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党史学科，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理论。

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是不平

坦的，党的历史也如同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遭受了无数的挫折，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风险。研究党史，固然要讲历史的规律性，但也要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既要讲革命高潮，又要讲革命的低潮；要讲成功的经验，也要讲失败的教训。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历史经验，使革命的人民了解中国的昨天与现实今天的历史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念；用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和好作风，教育和鼓舞人民，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历史的借鉴，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党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任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我国结束了几千年以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它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篇章。研究党史，应该把党的活动纳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范畴来考察，不要离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孤立地讲党史，防止党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要正确反映中国和世界历史与党史的联系，从当时历史的全局和整体出发，把党的活动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才能全面地说明党的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党史更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科，党史研究的成果应该是过去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反映。研究党史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某些方面，我们并没有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

历史，喜欢搞一言堂，由一个人说了算，以权代史，以言代史，于是历史受到践踏，这就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中“左”的和封建的意识，以达到篡改、伪造历史的目的。他们大搞现代迷信，神化领袖，荒谬地把党史写成个人英雄史，或者写成只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历史是无情的，不尊重历史，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和伪造历史的人，只能落个遭千古世人唾骂的悲惨下场。党史学科是深受他们破坏的一个重灾区，更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

党史的科学性和党性是一致的，周恩来同志生前再三强调撰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这也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在党史研究领域，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还相当普遍，它不仅是十年浩劫的产物，而且由来已久，烙印极深。有一些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和追怀战友的纪念文章，写得不够真实，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拔高、编造的现象。但对另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则避而不谈，如实在回避不了，不是在材料的取舍上有所偏颇就是在对问题的分析上有时无限上纲，对一些史实的评论不够公允。例如有的文章写毛泽东同志，过分夸大，突出个人，把他神化，本来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东西也说是他的，说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论断不符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实际活动情况，也抹杀了党的创立初期李大钊、李达、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等许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有些论述党的创立时期文章，常忌讳或回避提陈独秀。陈独秀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称他是“思想界的明

星”。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最著名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人们称之为“南陈北李”。当然，陈独秀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对陈独秀的功过也要作科学的分析，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必须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对于他的早期活动中作出的贡献也不能一概抹杀。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其本来面目。不要搞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好的写得过于好，故意拔高；坏的写得过于坏，故意贬低。对历史要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尊重历史，忠实于客观事实，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粉饰，不讳过。在这方面马克思对待拉萨尔、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科学态度，以及我们古代一些史学家很多好的范例，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主张客观主义。在党史研究中资料是重要的，应当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论证历史，必须从具体资料出发，从具体资料的分析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把论断建立在确凿的历史资料的牢固基础上。切忌从概念出发，作主观的推论和附会，标奇立异，把历史引入歧途。但要把党史研究推向前进，又必须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就要敢于面对传统的或权威的挑战，敢于坚持真理。研究中出现不同的结论，各抒己见，也是正常的。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鸣，以有助于党史研究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要提倡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总之，要注意做到党史研究文章应是研究成果，应是既有科学性又具有党性的学术论

文。

在党史研究领域，我们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成就，对党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应该承认还存在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和开拓。例如在军事、政治方面着眼较多，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相对地注意还很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不仅要推翻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党依据当时农村战争环境下的需要与可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经济建设，支持战争，同时极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二年，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不但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极端严重的物质困难，而且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为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这种生产运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使我党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且从一九四三年起逐步走向扩大。对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发展，应追溯到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党领导的文化运动和科学教育建设，情况也是如此。就是在政治、军事方面，也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深入研究和如实地把党的历史传之后世，是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追求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由拨乱反正而出现的思想解放，党史研究也冲破深重禁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仅仅五年时间，全国报刊发表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从质和量上来看，都是可喜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与我们党的历史的丰富

内容相比是太不相称了。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开拓新的历史局面而奋斗。我热切期望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无私无畏，发扬敢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共同努力开创一个党史研究工作兴旺、发展的新局面。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的党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为了反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选收了其中一部分学术论文，编成这部《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供我国史学界的同志和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参考。

这部论文选，选收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底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党史研究论文九十八篇，篇前有革命老前辈王首道同志写的序，篇后附有五篇资料，共计约一百六十万字。文章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党的建立与发展的研究，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的研究，关于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与历史经验的研究，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和演变的研究等。通过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深入、具体地了解党的光辉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敢于并善于向敌人作斗争的无私无畏的政党，是能够在任何困难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一切障碍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党。六十多年来党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一部无比丰富生动的光辉胜利的历史。但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下，党的历史受到严重的篡改和歪曲，成了他们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篡党夺权的工具，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领袖的形象，损害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也妨碍人们对于党的历史作科学的解释和研究，妨碍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妨碍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辟前进的道路。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几年来的党史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鼓舞下而蓬勃开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它是我们党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又一光辉典范，是科学地研究党的历史的结晶。它是我们衡量过去党史研究和指导现在和将来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和标准，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和应用。

收入本书的文章，在总的原则方向上是和党的这一时期的历史要求相一致的，是和《决议》的基本原则精神相一致的。绝大部分文章，通过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论证，有力地批驳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史领域中制造的谬论，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史领域中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扩大了党史研究的范围，填补了长期存在的一些空白。通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历史，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光辉历史，论述了

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历史地位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大的历史作用，赞颂了党领导人民长期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从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它所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都不是偶然的，说明它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因而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很多文章提供的材料和分析论证，有助于人们更具体地理解党的《决议》，使人们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坚信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

几年来，我国史学界贯彻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思想上、学术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对不少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对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和成员问题，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和代表问题，对于党的民主革命时期总路线的形成过程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问题，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时间和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评价问题，对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若干史实和评价问题，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等，都有不同观点的文章或争鸣的文章。这些不同观点的文章，一般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一定的水平。

但是，也应该看到，科学地阐述党的历史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确实的资料，而且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较高水平。收入本书的文章，绝大部分写成于《决议》之前，一般都为个人所作，因而带有一定的探讨性和某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并不都是很成熟的。因此，这就希望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本材料时，应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应以党的《决议》、“十